

震旦博雅书系

感悟考古



李伯谦 著

写给青年学者
的考古学读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雅书系

感悟考古

李伯谦



李伯谦 著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悟考古 / 李伯谦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7

(震旦博雅书系)

ISBN 978-7-5325-7218-2

I. ①感… II. ①李… III. ①考古学—文集 IV.
①K8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2874 号

震旦博雅书系

感悟考古

李伯谦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20 插页 5 字数 269,000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800

ISBN 978-7-5325-7218-2

K · 1853 定价: 7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作者近照

目 录

导言.....1

考古工作者应该具有科学的挑战精神.....49

发扬“疑古”精神,推进学术繁荣.....51

饶宗颐先生的学术实践对我们的启迪.....55

科学的挑战精神万岁

——寄语 2005 年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第九届“挑战杯”.....65

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69

试论吴城文化.....71

文化因素分析与晋文化研究.....89

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93

考古学文化的变迁.....99

从对三星堆青铜器年代的不同认识谈到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

“文化滞后”理论.....101

关于早期夏文化

——从夏商周王朝更迭与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关系

谈起.....109

考古学文化的互动.....117

考古学文化互动关系研究.....119

考古学文化与族属.....133

考古学文化的族属问题.....135

精神领域考古.....147

关于精神领域的考古学研究.....149

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

——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155

从崧泽到良渚

——关于古代文明演进模式发生重大转折的再
分析.....172

聚落演变与文明.....191

关于文明形成的判断标准问题.....193

中国考古学发展史.....201

中国考古学的历程.....203

中国考古学的60年：发展、贡献、问题与前瞻.....219

学科发展的有力见证

——《考古》创刊五十周年感言.....249

中国考古学学科建设.....251

中国考古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

——重读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札记.....253

谈谈近十年来的两周考古.....260

俞伟超与中国考古学学科建设.....266

对进一步做好西部考古工作的几点建议

——在“第五届西部考古协作会暨史前时代的中国西部——以云贵高原为中心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76

北京大学考古的传统.....279

与自然科学的不断融合是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趋势.....289

考古学与当今社会建设.....293

中国古代文明化历程的启示.....295

传承华夏文明 共迎民族复兴

——从河南省重大考古发现谈起.....306

导 言

《感悟考古》是我继 1998 年出版《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2011 年出版《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之后的第三本论文集,前两部集子,除很少几篇涉及考古学理论、方法,大部分文章是关于中国青铜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某个个案的研究。在风格上,收入前两部书的多是比较规范的研究论文,是在查阅充足资料基础上经过反复分析、比较写成的,不是专门学习研究考古、历史的朋友,读起来会觉得枯燥乏味;而收入本书的则主要是为研究生讲课、共同讨论问题的内容整理及相关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等,多是自己研究过程中有关方法论和考古理论方面的心得体会,文字比较浅显,容易理解。

我 1956 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年后分专业进入考古专业,1961 年毕业留校,至今在考古战线摸爬滚打已有 52 年的历史。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除“文革”有几年工作停顿和学业荒废,粗算起来,参加过的正式考古发掘 20 多次,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新石器时代的陕西华县元君庙、泉护南台地,甘肃永登连城,青海乐都柳湾,青铜时代的河南偃师二里头、安阳殷墟,北京昌平雪山、房山琉璃河,江西清江吴城,湖北黄陂盘龙城、荆州荆南寺,山西曲沃曲村、北赵等;考古调查 50 来次,北至黑龙江肇庆,南至广东揭阳、汕头,西至青海西宁,东至山东泗水;至于考古现场的参观考察,更是遍布除新疆、西藏、海南之外的所有省区,数不胜数。这些活动,多是指导学生实习,或者带有科研任务,和游山玩水不同,每到一地,几乎都要亲自动手,一边看,一边想,随时接受同学询问,和同学、同事、朋友讨论问题。跑的地方多了,动手的机会多了,积累的材料多了,在动手发掘和整理、分

析、消化材料过程中,在查阅相关研究文献过程中,自然就会产生一些想法,形成观点,收在前两部集子中的文章,基本上都是这样写成的。这些就某个方面、某个问题研究的文章写得多了,慢慢地便有了些规律性的认识和近似方法论、考古学理论层面的体会,我初步归纳为17个小节,作为《感悟考古》的导言,相关的文章则依内容分为几个专题刊出。

一、考古学是什么

这个问题,不仅是学考古的同学要问的,也是普通大众有疑惑的,其实我自己就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

我家在河南农村,上的是荥阳县县城唯一的高中,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考古,不过初中、高中都有历史课,我学得还算不错,考试都在前几名,1956年就考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到历史系学了一年,第二学期期末,各个专业的老师开始动员大家报名选专业,有中国史、世界史、考古三个专业。考古教研室来动员的是吕遵谔老师,当时是教研室的学术秘书,现在是我国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他说得特别好:“你们学考古,会经常出野外,可以游山玩水,名山大川都能去,学中国史、世界史就没有这个机会。而且,学考古的还要学中国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学中国史尤其是学世界史,除了有考古通论课,专业考古课是没有的,你们比他们学得多。考古专业的学生还可以照相,教研室有照相机,你们有这个课。”那时候照相机还很稀罕,不像现在几乎人人都有。那时年龄小、玩心大,和要好的同学一商量,就报了考古专业,学了考古,其实当时对考古知道得并不多。说实在话,同今天的学生相比,知识面特窄,尤其是像我这样从农村来的同学。今天考古专业的学生入大学以前肯定都知道考古是干什么的,可那时,我们真的是一知半解,觉得好玩儿,就来了。

1956年入学,1957年反右派、搞运动,1958年过共产主义暑假,不放假,吕先生就带领我们五六、五七两个考古班到周口店作发掘。

当时刚上过吕先生讲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课,同学们情绪很高,那是一段愉快的、很有意思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当时裴文中、杨钟健、郭沫若(当时是科学院院长)、贾兰坡都去过工地,我见到了很多著名的学者。郭老还同我们讲过话,至今我还珍藏着郭老、杨老、裴先生、贾先生和我们在一起的照片。大热天的,虽然每天汗流浹背,但大家有说有笑过得特痛快,而且还真挖到不少东西,认识了好多古代已灭绝的动物骨头,如剑齿象、猎狗、肿骨鹿什么的。当时晚上或者遇下雨天还上课,学习与旧石器考古有关的知识,还组织科研小组,让同学们查资料、访问科学家、老技工,编写《中国旧石器考古小史》,这时对考古虽然还不能说很懂,但至少不像以前那样神秘了。

到了1959年,我们迎来了列入教学计划的正规的田野考古实习,当时学苏联叫生产实习,是跟现在北大考古系一样的本科实习,地点在陕西华县柳枝镇的泉护村和元君庙。学过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都知道这两个有名的遗址,它们的报告都出版发行了。当时是李仰松老师带队,辅导老师还有白溶基,是严文明老师他们一个班的,他是朝鲜族,后来回朝鲜去了。实习从3月中旬开始到8月初结束,然后有半个月的参观,我们去了临潼、西安和宝鸡,一共是四个多月。这次实习,从我对考古的认识来说是个分水岭,以前懵懵懂懂只是知道点皮毛,后来通过周口店发掘再到这次实习,对考古的认识逐渐加深了,考古究竟是什么,这个时候才有所体会。回想当年夏鼐先生讲《考古学通论》,说“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考古学和文献历史学是车之两轮”,并没多大在意,直到这次实习才真地感到确实是有道理的。实习时我主要在元君庙,这是一处仰韶文化早期的墓地,墓坑一排排、一行行很有规律,墓坑内一个人,两三个人,五六个人,十几个人,有男有女,或全是男的,或全是女的,也有几个男的或几个女的和一个小孩埋在一起的,有的是一次葬,有的是二次葬,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兄弟、姐妹、夫妻、父子、母子、甥舅、姑侄?还是别的。为什么有的是一次葬,有的是二次葬,有的是一次葬

和二次葬在一个坑里？同学们一时间争论得不可开交，各不相让，通过老师的引导，慢慢地才觉得这可能是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的情况。尽管文献上说过古代曾有“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阶段，但像这样具体的活生生的例子由我们亲手挖出来摆在大家面前的情况，却是任何古书上都没有记载过的。中国号称史学大国，中国有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是二十五史，此外还有野史、方志、私人笔记等等，尽管很多，但并不是特别全，以上这种情况就没有记载。另外，文献上记载的是不是都可靠呢？其实，后来我们才知道有很多并不是都可靠。比较早的、先秦时期的文献，都是口耳相传、经后人一代一代记录下来的，这中间可能就有误差，甚至有美化当时帝王们的溢美之词，并不是很真实的反映。而通过考古挖出来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当然本身也需要一个艰苦的解读过程，因为它们没有写着是什么，特别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和原史时期。现在再回味当年夏先生讲的“考古和文献史学是车之两轮”的话，再回味吕先生动员选专业时跟我们讲的，考古有考古的优势，考古可以走出去，去野外，看到实实在在的东西的话，就感到很亲切，很有道理，我们很庆幸当年报了考古专业。我们班26个人，除去两个越南留学生，还有24个中国同学，毕业时因为分配的原因有两位同学没干考古，其他的都在这一行。而且我的这些同学在各地干得都还不错，有省、市考古机构或博物馆的正、副所长、馆长，都是研究员、研究馆员职称，不少人出过专著或论文集。所以，对于考古专业的学生，对于从事考古这一行的每一个人来说，正确认识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弄清楚考古学科的定位，十分重要。我想有的人也会经历这样的认识过程，一次实习，也可能是个分水岭，喜欢考古的就热爱上它了，不喜欢的将来就改行了。现在看，改行也没关系，即使你干了别的，在学校学的这些东西对你还是有用的，实习这几个月不是白白浪费时间。

我们国家，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同国外的联系，包括考古在内的学术界的联系，除了苏联老大哥，基本上处在断绝的状态。那时候，就是一门

心思向苏联学习。阿尔茨霍夫斯基的《考古学通论》、蒙盖特的《苏联考古学》、柯斯文的《原始文化史纲》等苏联学者的著作,就是在那段时间翻译过来的。至今我还清楚记得,1956年我们入学不久,高年级同学常常谈起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来华讲学受到热烈欢迎的情景,当时历史系还专门请了一位叫安东诺娃的专家来上课。说实在的,向苏联学习的确学了不少教条主义的东西,以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但我也不认为学的全是错的,苏联考古学强调考古要研究社会结构及其发展规律,就是对的。考古发掘,从挖探沟到开大方大面积揭露,也是从苏联在乌克兰底里波里遗址发掘积累的经验借鉴过来的。我们自己学得不好,不能全怪别人。在这里我还要说一说,我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对我的研究影响很大,我自己觉得受益匪浅。我认为研究考古上的问题,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但我不同意研究问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提法,2009年4月我在“中国古代国家与文明起源”研讨会上所作的《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原载《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6期,后收入沈长云、张翠莲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的发言,即明确阐明了我的观点。如果一定要用“立场”这个词,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只能是“实事求是”。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路线,一下子打开了同国外联系的大门,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像潮水一般涌了进来,一向保守自闭的中国考古学真有些应接不暇。面对如此局面,不能说视之为洪水猛兽想拒之门外的人一个没有,但绝大多数都持热忱欢迎的态度。客观地讲,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的传入,改变了中国考古学一直以来死气沉沉、缺乏理论探讨的面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说到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张光直先生。张光直是美国哈佛大学考古人类学教授、北京大学考古系(1983年从北大历史系分出成立的)客座教授,1984年,应北大考古系主任宿白先生邀请来讲学,他讲的《考古学专题六讲》,将西方流行的主要考古

学理论深入浅出地介绍给大家,什么聚落考古、行为考古、过程考古、后过程考古、文明起源模式理论等等,几乎都是第一次听到,既新鲜又羡慕。为了尽快让同学们了解和掌握国外考古学的情况,宿白先生和张光直先生还拟定了一个陆续邀请来北大讲学的国际著名考古学家名单,并且有几位已经来上过课,张先生也先后邀请了邹衡教授、俞伟超教授到美国访学。从那时到现在,快30年过去了,看到现在在国内、国外的交往如此频繁热络,像家常便饭一样,好不感慨!我说张光直先生是架起中外学术交流大桥的人,一点都不为过。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的传入,主流是好的,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这点必须肯定。但有个现象值得注意,同样是西方的理论,同样都是著名学者,但之间看法也不一样。其中涉及考古学学科性质的,如“新考古学”的提出者之一宾福德,是将考古学归入人类学的,1962年他发表的成名大作题目就叫作《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他反对考古学常用的从考古材料入手研究历史的方法,而主张用文化人类学常用的所谓“模式”去演绎历史进程,当然,他也说得出的结论需要验证。“新考古学”提出后,在国外、国内都引起强烈反响,反对者有之,拥护者有之,对其是非功过,在这里我们不作讨论,我只是强调,考古学可以并且应当借鉴人类学的某些研究方法,重视通过发掘出来的遗迹、遗物乃至遗迹现象,去研究和揭示人类的思想、行为,全面地复原历史,但考古学和人类学毕竟在研究的对象、方法、手段等方面有所不同,如果将考古学纳入人类学,实际上就等于取消了考古学。过去有一种误解,似乎考古学就是挖东西、器物排队。1958年科学“大跃进”,批判考古学是见物不见人,当时苏秉琦先生是考古教研室主任,说你光讲地层学、类型学,都是死的,见不到人的活动。其实,遗迹也好,遗物也好,都是古代人类所从事的各种活动的遗留,是他们特定的思想和行为的产物,考古学的任务就是运用科学的方法、手段把它们发掘出来,运用科学的方法、手段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将其蕴含的、反映的思想、行为揭示出来,去复原历史。这是一个连续的科学的过程,没有在地层学原理指导下的发掘,就不能有序地揭露出这些东西,没有按照类型学原理去分析研究这

些东西,就不能进到更高层次的研究去揭示其蕴含和反映的历史的真谛。设想如果不懂得发掘,不懂得器物排队做类型学研究,还怎么能再上升一步去见到背后的人的活动呢?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确,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迷失方向。谁能坚持做到这一点并在今后的工作中持之以恒,谁就能充分发挥作为历史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考古学的优势,为复原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做出自己的贡献。另外,从我们学习的一方来看,不必讳言,也存在不问具体情况,是否合适,觉得只要是外国的就是好的,拿来就用,生搬硬套,结果适得其反。正确的态度,我认为应当是立足于我们自己的考古实际,对国外涌进来的理论也好、方法也好,经过缜密的分析,有选择地使用,在使用中甚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加以修正、改进。

在我接触的学生中,尤其是初学考古的学生,常常会问考古有什么用?他们说:“你说考古是历史科学,是研究社会发展规律,这也对,能理解,但研究清楚了,又有什么用呢?”我觉得这未免太实用主义啦,太近视了。学考古、学历史怎么能没用呢?学考古、学历史,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以后发展的方向。我自己是有体会的。2010年到新加坡参加“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第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有一个发言,题目是《中国古代文明化历程的启示》,中国古代文明经历了酋邦(古国)—王国—帝国三个发展阶段,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它对现在的发展有什么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呢?我讲了六点:

第一,“文明模式的不同选择导致了不同的发展结果”。我认为崇尚神权的红山古国因过度浪费社会财富盛极而衰,而崇尚王权、比较简约的仰韶古国则通过龙山文化、夏商文化传承下来了,“事实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是决定其能否继续生存发展的关键”。

第二,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历程“是不断吸收不同民族文化先进因素的历程”,“实践证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不断壮大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第三,中国“从氏族部落社会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血缘关系和由此而产生的祖先崇拜,是自身保持绵延不绝、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第四,“共同的信仰和共同文字体系的使用和推广,是维护自身统一的重要纽带”。

第五,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等理念及在其指导下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等关系的实践,是自身比较顺利发展的保证。

第六,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对保证大型工程的兴建和国家的统一,发挥了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过度运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创造性。

我感到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至十八大作出的一系列重要决策,都从中国历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中汲取了营养,这难道不是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受到的启发吗?

这是主要的,但考古学的作用绝不止于此。以文化遗产的保护为例,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到十八大连续发出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号召以来,包括文化遗产保护在内的文化事业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回顾我国考古事业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历史即可看到,两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文化遗产性质、年代、价值的确定,要依靠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文化遗址保护规划的制订、遗址公园的建设,需要考古工作者的参与。同样,没有文化遗产的保护,考古也将失去自己活动的空间。

总之,考古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我们每一位考古工作者都应该扬眉吐气,决不可妄自菲薄。

二、从地层学到埋藏学

认识到考古学的重要性了,那它和狭义的历史学究竟有什么不同?我们曾说到它们研究的对象不一样,历史主要靠文献记载来研

究,考古是要靠实实在在的实物,在考古学者通过不同时代人们在生产活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遗留下来的东西,来研究人类的历史。其次,方法也不一样。考古学者要把遗留下来的遗存科学地发掘出来,那就要依据地层学和类型学两个基本方法。要特别强调,学生在实习阶段,地层学和类型学这两个基本的法宝一定要掌握,否则以后考古学就很难有比较大的发展,自己运用不好,也很难写出令人满意的文章。

地层学,大家都知道是借鉴自然科学中地质学的地层学过来的。那地质学上的地层学和考古学上的地层学有什么不同呢?地质学上的地层是自然变化形成的不同的层,而考古学上的地层是人类活动留下来的不同时期堆积形成的层,本质区别在这里。因此,它就具有复杂性,比自然层复杂得多,解读起来难度也就更大。所以,我们必须掌握,什么是地层,怎么划地层,怎样根据土质土色辨别地层。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步,还需要知道地层是怎么形成的,尤其是考古的地层,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有时候人类活动的结果和自然力量是交织在一起的。如可能突然出现一个间歇层,间歇层里没有陶片,全是沙子,那是发洪水形成的东西,是自然形成的东西。在学习地层学过程当中应有一个概念,就是对地层形成能有一个认识,因此,就要引入埋藏学的概念。埋藏学也是旧石器时代考古使用的概念,主要是研究这个层怎么形成的,什么原因形成的,多长时间之内形成的,它有什么不同的特点。如我们学习国外的一些考古学理论,提到界面理论,在中国考古学发展过程中基本上没有这个概念。西方提到有界面,所谓界面,层和层交会会形成界面,其中界面也是不同情况下出现的,在划分地层的时候怎样辨别出来?而过去我们机械地理解地层,把地层看得是绝对的,只知道划层,那么遇到房子、灰坑、墓葬怎么办呢?过去是强行归层,如说某某房子是三层房子、某个墓葬是四层墓葬,等等。后来就觉得不妥当,我自己学习的时候就没有很好地掌握这一点。说这一层中有灰坑、有房子、有墓葬,这个现在说来肯定是不对的。当时邹衡先生告诉我说任何一个遗迹单位就相当

于一个地层单位,一个房子、一个墓葬、一个灰坑也是一个地层单位,要把它当成一个地层来理解。那时主要讲分期,谁早谁晚,把它们都当成地层单位,不能说一个层里面包含有房子、灰坑、墓葬、陶窑。这是对的,但我觉得还不够,还要有埋藏学的概念,把它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我这个概念从哪儿来的呢?其实,理解得很晚。对我刺激最大的是在1986年我们在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的调查,遇到一个窑厂取土,很大的泥炭层,发现有陶片,引起了注意。结果发现陶片确实是早的,一万年或一万年多一点。一个泥炭层,一层四五十厘米,从土质土色看不出多大区别,但测年的结果使我大吃一惊。一层当中不同的标本测定结果不一样,它的年代跨度相当长,可能是1000年到2000年,它怎么形成的?为什么靠上的时间就晚,靠下的时间就早,为什么划分为一层?因此,对地层学不能机械的理解。首先,一个层不管堆积的厚薄并不与其年代跨度成正比,不是说堆积这一层越厚它的年代越长,这一层越薄时间不一定就短。所以,就使我感到应该借鉴旧石器考古的埋藏学概念,来研究它是怎样形成的,不同的层有不同的时间段。过去我们做新石器时代以后考古的,老是批评旧石器时代考古不分层、不科学,他们10或20厘米一层。土质土色是我们最基本的概念,他们不讲土质土色。其实我觉得应该把旧石器时代考古划分地层的方法与土质土色结合起来,这个各有各的道理。现在旧石器时代考古也在改变,照顾到土质土色,在这个前提下,一二十厘米划分一个地层,人为做的,最后研究的结果可能就是有差别。现在出土的骨头、陶片用GPS定位,这是很有道理的。在一个层里不同深度可能反映不同的问题,所以一定把埋藏学的概念引入,把它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研究不同层的形成,有的可能很快就形成了,如房子突然倒塌,一层就形成了,如果是倒垃圾,就是日积月累形成的,跟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有了埋藏学概念就会问这个是怎样形成的,它对我们研究考古学包括年代分期有什么不同的作用。我觉得这个观念要在我们自己的体验中看有没有道理。这里就涉及发掘时在一个大层里要不要划小层的问题,过去着眼点在分期,通常